

特展  
介紹

# 古人掌中書——院藏巾箱本特展介紹

■ 許媛婷

現代人常以「袖珍書」、「口袋書」泛指開本尺寸小巧的書籍。但你知道嗎？古代也有這類書籍，而且有個特別名字稱為「巾箱本」。這種小書，由於它的外型小巧細緻，便於攜帶，深受傳統士子文人的喜愛與收藏。然而，對多數人而言，巾箱本這個名詞十分陌生，究竟何謂巾箱本呢？它又是如何出現與轉變的呢？再者，巾箱本是否就是同於今日所稱的袖珍本？透過圖書文獻處於2018年12月23日至2019年3月10日推出的「古人掌中書」特展，正好可藉此深入探討巾箱本的來龍去脈。

80

故宮文物月刊

431



## 何謂巾箱本

在說明何謂巾箱本之前，得要溯其源流，首先探討最早的巾箱本出現於何時？但這恐怕是個難以定論的問題。

從追索文獻過程中，今日可以找到相關書籍記載的，像是相傳由晉朝葛洪（283-343）撰《西京雜記》小說後跋裏提到「洪（按：葛洪）家遭火，書籍都盡，此兩卷在洪巾箱中，常以自隨，故得猶在。」以此標榜《西京雜記》二卷係因葛洪置於隨身所攜巾箱之中，所以未被祝融焚燬而倖存下來。又據現存最早類書為唐朝虞世南（558-638）《北堂書鈔》，書中〈巾箱三十三〉「王母巾箱」條下引《漢武內傳》「武帝見王母巾箱中，有一卷小書。王母曰：『此《五岳真形圖》。昨青城諸仙就我求，今當付之。』」其後，北宋李昉（925-996）奉敕編撰的著名類書《太平御覽》卷七百十一〈巾箱〉亦引《漢武內傳》相同內容。從明代朱謀壘（1584-1628）《畫史會要》所述，其在《漢武內傳》的基礎下，顯然加入更多的想像：「武帝好僊道……帝見西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，盛以紫錦之囊。帝問此何書，王母出以示之曰：『此《五岳真形圖》也。』王母以帝非仙才，不肯授。帝固請不已，乃得拜賜。」看起來，似乎早在漢朝已有巾箱小書的出現。然而不論是《西京雜記》，還是上述圖書所引《漢武內傳》，其作者及年代仍有極大爭議，內容亦多記傳聞軼事，故後世多認為係魏晉文人偽託之作。

由此看來，為求較高的史實可信度，仍得從正史記載中取得較為可靠的說法。根據現今可證史料，應係自唐朝李延壽撰《南史》所載，得知南齊王蕭鈞（473-494）為「巾箱五經」典故的創始人。

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，部為一卷，置於巾箱中，以備遺忘。侍讀賀玠問曰：「殿下家自有墳素，復何須蠅頭細書，別藏巾箱中？」答曰：「巾箱中有五經，於檢閱既易，且一更手寫，則永不忘。」諸王聞而爭效為巾箱五經，巾箱五經自此始也。<sup>1</sup>

侍讀官賀玠所稱「墳素」，係指「三墳八索」，泛指古代典籍。再者，依照「巾箱五經」事蹟看來，當時所謂的「巾箱」，確實是指專門收納頭巾或雜物的小型箱篋。蕭鈞親自以細書（小字）抄寫合稱「五經」的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一來以備遺忘之時，可以隨時翻閱；二來由於親手寫過，不易忘記。蕭鈞雖非創製巾箱本的第一人，然其巾箱五經為眾所學習取法，並蔚為風潮，當可被視為開風氣之先。（圖1）

之後，南朝梁武帝蕭衍（464-549）第七子元帝蕭繹（508-555）起而效尤，又青出於藍，而更勝之。根據他自己撰寫《金樓子》〈聚書篇〉提到：「又聚得細書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周官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毛詩》、《春秋》各一部。又使孔昂寫得《前漢》、《後漢》、《史記》、《三國志》、《晉陽秋》、《莊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肘後方》、《離騷》等，合六百三十四卷，悉在一巾箱中，書極精細。」<sup>2</sup>因而可知，蕭繹在範圍及數量上皆超越蕭鈞的「五經」，顯示當時流行的巾箱本已不再侷限於文人伏案研讀的儒家經典，而擴及於史部、子部及集部類圖書，呈現多元化發展。

換言之，此類小尺寸的書籍袖珍精巧，被文人置於擺放頭巾的箱篋之中，不僅方便隨身攜帶，且易於收藏閱讀，遂被稱為「巾

箱本」。在雕版印刷術出現之後，書籍抄錄益趨式微。自唐而宋，版印逐漸取代抄寫，成為書籍出版的主要形式。當時的出版市場蓬勃發展，發行內容擴及經史專著、詩文歌賦、科舉用書，以及旅遊指南、小說戲曲、醫藥用書等。巾箱本以其小巧易攜，利於流通，終能異軍突起，受到文人垂青，成為出版市場的另一寵兒。

### 巾箱本的其他稱呼

西元五、六世紀的南、北朝，將尺寸小巧的書籍稱為巾箱本，然而這類書籍真正開始蓬勃發展，繼而大量傳播，應在北宋、南

宋之際。此時，坊市之間的巾箱本開始有了不同的稱法，有將其稱為「小本」、「小冊」或「小書板」，其雖無固定尺寸，然明顯較一般開本更為袖珍。

根據南宋李燾（1115-1184）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二百六十六引北宋呂陶記聞：「嘉祐、治平間，鬻書者為監本字大難售，巾箱又字小有不便，遂別刻一本，不大不小，謂之中書『五經』，讀者競買。」可知北宋年間除了大型開本的官刻本、小型開本的巾箱本之外，又出現了中書（介於大、小字之間的中體字）開本的「五經」，甚受文人歡迎。

其後，南宋理學家朱熹（1130-1200）不



圖1 「五經」 明嘉靖間覆宋刊巾箱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但著書講學，同時也從事刻書活動。他曾經與另一位理學大師呂祖謙（1137-1181）的書信中，頻頻提到小本、小冊。像是：

小本《易傳》尚多誤字，已令兒子具稟。大本校讎不為不精，尚亦有闕誤。……《橫渠集》已畢未耶？得本早以見寄，幸甚！如此間《程集》，似亦可作小本流布。蓋版在官中，終是不能廣也。<sup>3</sup>

之後又提到：「新刻小本《易傳》甚佳，但籤題不若依官本作《周易程氏傳》。」另外，朱熹亦有將巾箱本稱作小冊，同樣是指小開本的書籍：「近見建陽印一小冊，名《精騎》。云出於賢者之手，不知是否？此書流傳，恐誤後生輩，讀書愈不成片段也。」<sup>4</sup>

而在張栻（1133-1180）與朱熹的往來書信〈答朱元晦秘書〉寫道：「比聞刊小書版以自助，得來論乃敢信。」<sup>5</sup>張栻則稱這種巾箱本為「小書板」。由此可知，南宋孝宗到寧宗嘉定年間，書坊將書籍編印成小本販售於書市，主要是取其小巧精簡、方便攜帶，而在文人之間甚受歡迎，廣為流傳。

### 巾箱本與袖珍本的關係

不過令人更為好奇的是，今日我們常聽到的「袖珍本」是否與巾箱本一樣，同指小本、小冊或小書版之意？袖珍本又是何時才出現的呢？

事實上，「袖珍」一詞出自明太祖第五子的藩王朱橚（1361-1425）之手。周定王朱橚自幼好學，尤喜植物，對於各種醫方、藥方極有興趣。初就藩於河南開封府，後遷至雲南滇陽。他曾令府內醫官李恒編纂《保生餘錄》、《普濟方》等書，但感慨所蒐藥方

雖多，亦多訛誤。洪武二十三年（1390），他又命醫官編纂《袖珍方》，並親為之序。序云：

嘗令集《保生餘錄》、《普濟方》等方，方雖浩瀚，編輯多訛。至洪武庚午（按：二十三年）寓居滇陽，知彼夷方，山嵐瘴癘感疾者多。惜乎不毛之地，里無良醫，由是收集諸方，得家傳應效者，令本府良醫（按：李恒）編類，鈔諸小板，分為四卷。方計三千七十七，門八十一，名曰袖珍。

袖者，易於出入，便於巾笥；珍者，方之妙選，醫之至寶，故名袖珍。數年已來，印板模糊。今於永樂十三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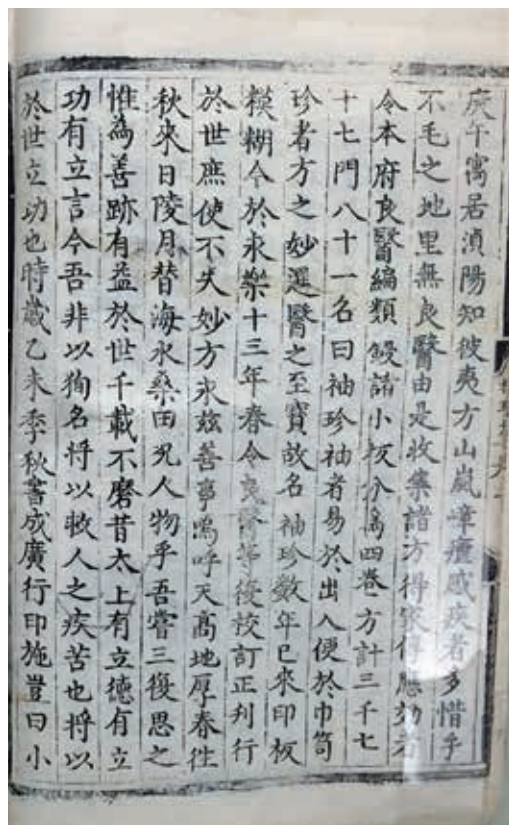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明 朱橚、李恒編 《袖珍方》 明正德4年（1509）御用太監廖氏中州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

圖3 「九經」 明覆宋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(1415) 春，令良醫等復校訂正，刊行於世。庶使不失妙方，永茲善事。<sup>6</sup>

換言之，根據朱橚〈袖珍方序〉得知當時取名為袖珍二字，係因「錢諸小板」，再者有「袖者，易於出入，便於巾笥；珍者，方之妙選，醫之至寶，故名袖珍。」（圖2）《袖珍方》概念係以小板刊印，而朱橚取名為「袖珍」二字則是兼有小巧隨身、珍貴至寶的雙重意涵。顯而易見，袖珍本確實源自巾箱本的意涵及功能，然更強調其視若至寶的珍藏價值。

於是，明、清之際「巾箱」漸為「袖珍」一詞取代。時至今日，袖珍小本形制的發展趨勢，亦已從注重易攜便取的實用性逐漸轉向強調精巧趣味的裝飾性。「巾箱本」一名雖不再廣為人知，袖珍本仍是大眾喜愛的隨身讀物形式。

### 巾箱本五經

由於蕭鈞「巾箱五經」的典故，深植人心，使得後世在提到巾箱本典故時，多以此事為源頭。諸如南宋戴埴《鼠璞》便提到：

今之刊印小冊，謂巾箱本。起於南齊衡陽王鈞手寫五經，置巾箱中。賀玠曰：家有墳素，何須蠅頭細書？答曰：檢閱既易，且手寫不忘。諸王從而效之。古未有刊本，雖親王亦手自抄錄。今巾箱刊本，無所不備。<sup>7</sup>

南齊王蕭鈞擇取「五經」為手鈔巾箱本之代表，呈現當時對此五部儒家經典的看重。早在漢武帝設置「五經博士」開始，學子可以通過考試獲取官位，通曉儒家經典變成為官享祿的主要條件。其後，唐代學官又將《春秋》分成《左傳》、《公羊傳》、《穀梁傳》，



圖4 | 《十三經註》 清咸豐2年（1852）稽古樓刊巾箱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又將《禮》分為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。三傳、三禮及原有的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，合稱「九經」。（圖3）

至唐文宗開成年間，官方再加入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及《爾雅》，與「九經」合稱「十二經」。南宋以後，宋儒再將《孟子》納入，而形成儒家典籍中的「十三經」。隨著經典的定制與確立，古代文人巾箱中亦出現「九經」與「十三經」，並得獲保存至今。（圖4）

### 古人展書讀

事實上，巾箱本開始蓬勃發展，繼而大量傳播，應在南、北兩宋之際。時雕版印刷術的發明應用，使得書籍的出版流通愈益快速。另一方面，民間書坊商家為迎合市場需

求及追求商業利益，更不斷出版經、史、子類文人仕進用書，以及科舉考題大全、時文、字書、韻書、文人詩文集等。

在宋朝被稱為「小本」、「小冊」或「小書板」的巾箱本，雖無固定尺寸，然較一般開本更為小巧，也因為方便攜帶，便於流通及成本低廉等特性，在出版市場上廣受歡迎。

以現存南宋山堂先生章如愚（生卒年不詳）編撰《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》，簡稱《山堂考索》或《群書考索》為例，便是書坊以小冊形式刊行，作為學子參加科考隨身所攜的重要類書。

章如愚，字俊卿，婺州金華（今浙江）人。入仕後因得罪主戰派韓侂胄（1152-1207），後罷歸講學山中，時人尊稱山堂先生。南宋之際，是書原僅有十門一百卷，到了元、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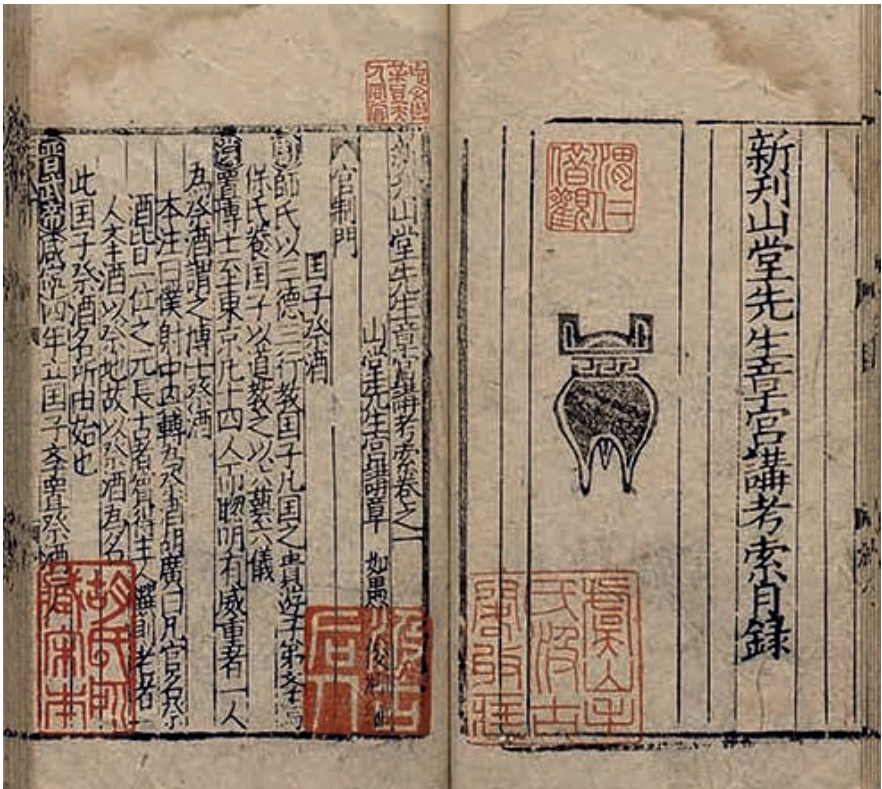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5 《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》 宋刊巾箱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兩代不斷增補，最終多達四十六門二百十二卷。書中收錄歷朝時政與典章制度沿革，並徵引經史百家之書，在南宋私人纂述的類書之中，堪稱最為豐富且完備的一部。（圖5）

院藏共計兩部《山堂考索》，其一為南宋巾箱本，然僅殘存後集「官制門」十冊，從其卷次及裝潢視之，應係書坊為求營利，以部分卷帙佯充全本；另一部則為元代延祐庚申（七年，1320）圓沙書院刊印之本，全帙三十二冊，內含前集、後集、續集以及別集，係經後人不斷增補，然內容豐富齊備，

仍舊成為歷來學子參加科考用以隨身之重要讀物。（圖6）

此外，亦有據巾箱本底本影鈔的本子，像是晚清之際湖北的私人藏書家楊守敬（1839-1915）便曾根據宋刊巾箱本《周禮》影鈔而成，最後自己留下影鈔本，而將原刊本售或贈予另外的藏書家。根據楊守敬《日本訪書志》所述，其於赴日日期間獲得南宋槧巾箱本《周禮鄭氏注》十二卷，知其傳世甚少而感欣喜。但是其後又因「江陰繆荃孫編修愛不釋手，乃影摹一通，而以原本歸之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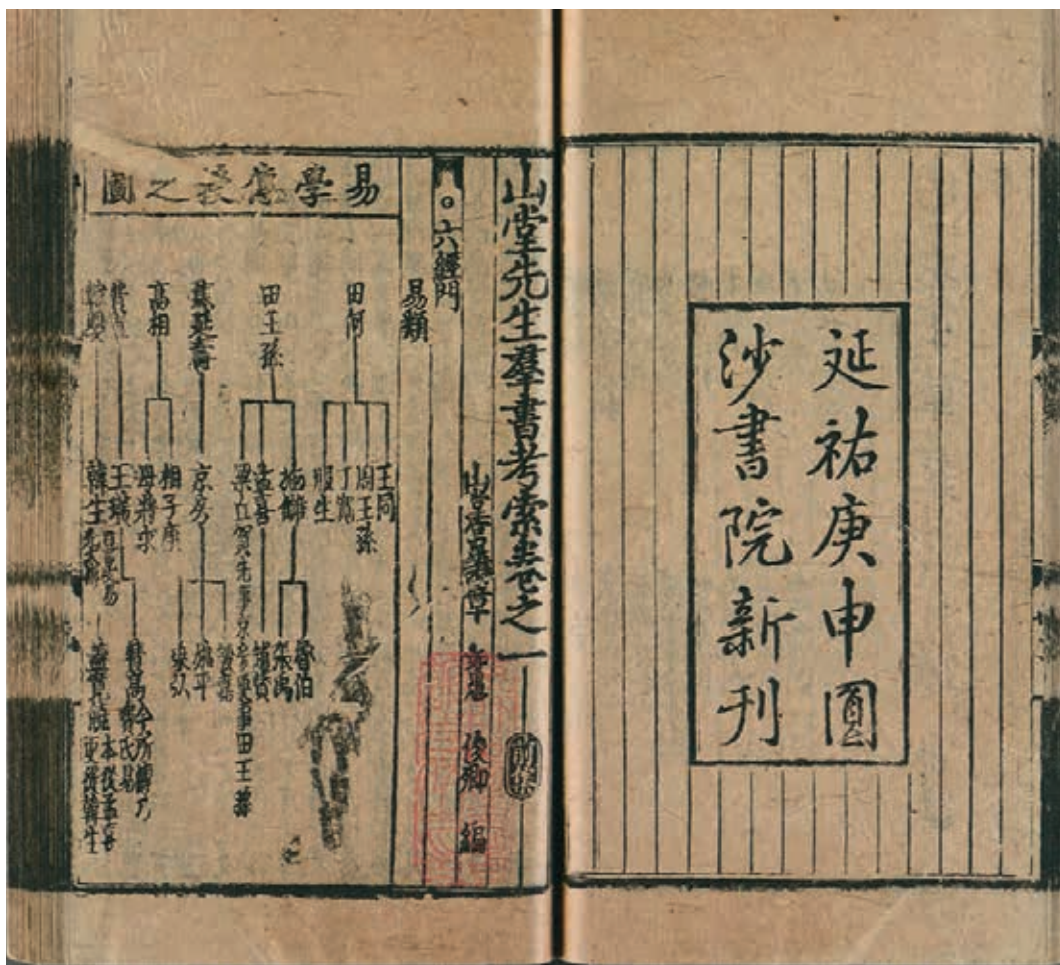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6 《山堂先生群書考索》 元延祐7年圓沙書院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

圖7 | 《周禮》 清光緒間宜都楊氏影鈔宋刊巾箱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8 | 《點石齋叢畫》 清光緒11年上海點石齋石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換言之，今日所見《周禮》抄本，係楊氏回國後照赴日期間所蒐南宋巾箱本的原式原樣影鈔而成。（圖7）

至於原來的南宋巾箱本呢？如楊氏所述，則是歸於被譽為近代圖書館事業奠基者的繆荃孫（1844-1919）所有。據其《藝風堂藏書記》即有記錄此書作「《周禮》十二卷。宋刊巾箱本。」從本書之影鈔淵源，從而可推知當時該巾箱本可能的實際尺寸、版式行款及其遞藏源流。

事實上，清末由於西方石版及鉛版印刷術的傳入，坊間書肆開始出現大量石印或鉛印小冊，成為晚清文人選購書籍的另一種選擇。《點石齋叢書》就是由英國商人美查（Ernest Major, 1830-1908）在上海經營點石齋書局以石印方式出版之畫譜。初印本為清光緒七年（1881）出版，而院藏此部為光緒十一年（1885）農曆十二月（1886年1月5

日至2月3日）印製的第二次再印本。（圖8）

全書十卷八冊，每卷起始有莊仁泳的標題題字，內容依題材分類：卷一、二為山水，卷三、四為人物，卷五為仕女畫，卷六為昆蟲、動物，卷七、八為花鳥，卷九則選錄清道光年間李耀門編纂《百蝶圖詠》，全為蝴蝶畫譜，卷十為「妙契同神」，以雜畫為主。

據美查自序稱，係以個人所蒐各式名人畫集，參雜江戶時期出版的日本畫譜彙改成帙，又云：「以泰西照相石印，縮成袖珍，優於用車攜帶。」<sup>8</sup>由於石印技法是一種利用油、水不相容原理發展出來的平版印刷，通常以磨平如鏡的石面製版，將圖像攝相於石面上，再以藥墨刷印而成。以此種技法出版圖書，不僅與原書無異，其成書快速、成本低廉，使商人獲利豐厚，趨之若鶩；加以石印技法又可縮印成小開本，便於舟車隨身，亦深受文人歡迎。



圖9 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 明天啟7年董其昌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## 皇家藏袖珍

以抄寫或刷印形式保存迄今的巾箱小冊，因外觀簡樸而被認為多流傳於民間坊肆，或供士子便取展讀，或供藏家翫索鑒賞，難入皇室典藏或皇家出版大雅之堂。事實上，本院所藏皇室善本圖書並不乏自宋而清各類巾箱本，內容多為佛典經籍、皇子臣工精鈔本、宮廷印本之屬。

以深藏清代宮廷的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（簡稱《般若心經》、《心經》）為例，此為印度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。所謂的「心」有精要、核心之意，意指本經為《大般若經》最為核心之精髓。現今以唐代玄奘法師（602-664）翻譯的本子流通最廣，全經二百六十字，為字數最少的佛教經典，同時也是最多人選擇以此經為積聚功德寫經之本。

此經為明天啟七年（1627）著名書畫家董其昌（1555-1636）七十三歲時所寫，清乾隆朝曾入藏「秘殿珠林」，位列上等。根據《秘殿珠林》卷二記載：「明董其昌書《心經》一冊，上等，黃七。朝鮮鏡光箋本，楷書款識云：天啓七年歲在丁卯元旦書。其昌。」又自跋云：「寫經俱用正書，以歐、顏為法，欲觀者起莊敬想。」所敘與本經末葉內容相同，即指此本。從董其昌跋語可知，所寫楷體正書雖是師法歐陽詢（557-641）及顏真卿（709-785）兩大書法名家，然實融合董氏自身空靈淡雅、線條圓厚潤澤之書寫風格。（圖9）

至於清初康、雍、乾三朝的皇家出版事業，除武英殿修書處以固定形式刷印殿本圖書外，亦可見皇帝親自下旨製作或臣工進呈的袖珍本。此類迎合君王旨意而客製化設計的小本小冊，或著眼開本尺寸的形制規律，或注重裝幀用料的富麗清雅，呈現出不同於

民間巾箱本的風格樣貌，也具體揭示了帝王個人品味與製作喜好。

若以清乾隆皇帝（1711-1799，1736-1795在位）仿效白居易（772-846）〈樂府詩〉五十首而擬作的《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》為例，原名為「御製用白居易新樂府成五十章並效其體」，刊印完成時間為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。此書印行後，除頒賜臣工外，亦不乏臣子在獲頒書籍後，或奏請重刊，或在皇帝諭令下繕錄重刻，以廣流傳。像是江蘇學政劉墉（1719-1804）、浙江學政王杰（1725-1805）、福建學政沈初（1729-1799），及江蘇學政彭元瑞（1731-1803）等人都曾在奏摺中寫下「恭照繕錄，敬謹重刊」，顯示此事是在乾隆皇帝同意下所為。

院藏三部《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》，除了彭元瑞寫刊本開本較為宏大疏朗之外，其中兩部開本偏小，尺寸近於袖珍本。圖左為王杰寫刻的進呈本，圖右為劉墉寫刻的進呈本。至於圖中，則為劉墉受命繕錄的《御製全韻詩》。這是乾隆皇帝在四十二年（1777）正月生母崇慶皇太后（1693-1777）病逝後的隔年正月至四月，利用政務餘暇所作，將歷代興廢之政治史實，配合一百零六韻分別寫就，再按平、上、去、入四聲分卷。然皇帝寫成之後，並未立即刊刻，而是在臣下劉墉、于敏中、沈初等人請求下，於四十四年（1779）才准許地方官員繕寫刊刻，流通全國。（圖10）

## 大書配小書

由於開本尺寸或裝幀形式，往往是書籍視覺美感的決定因素，也可能是讀者購藏與否的考慮重點。古代官方刻書機構或民間書



坊雕鏤鑄印的開版，通常是一種維護傳統形制與因應時代潮流的抉擇過程，是以最後刷印完成的書籍，便會出現開本大小不一的情形，可被視為前人出版文化多元發展的另一面向。

當各種開本尺寸不一的古籍展陳於前，讀者會產生什麼樣的視覺觀感？同一部書籍屢經製版付梓，其最大與最小開本的尺寸究竟有多少差異？版式、字體、紙張、裝幀等刷印細節是否亦有所不同？此等現象不僅深具版本學術研究價值，更是圖書發展史中最令人好奇的部分。本單元即以同一部書籍不同時代的不同開本為展陳重點，希冀觀眾在感受書籍蘊藏豐富知識之餘，亦得獲另一種

小大之間的玩趣體驗。

明中晚期從萬曆以迄崇禎年間（1573-1644），自元以來的戲曲文學流行於文人間，形成日常生活耳目之娛的重要來源。《琵琶記》原係元朝高明（字則誠，浙江溫州人，1306-1359）根據宋朝民間講唱文學〈趙貞女蔡二郎〉改編而成的南戲作品。高明將原先貪戀富貴功名、背親棄婦的蔡二郎改寫成與糟糠之妻趙五娘有了圓滿結局的蔡伯喈，其大幅改寫的結果，符合禮制教化及人心期望，使得蔡伯喈與趙五娘的愛情故事大受歡迎。到了明朝之後，則在傳奇文人的改編下，廣受歡迎，各種版本紛紛出現。

院藏明末古吳（今蘇州）書坊主人陳長



圖10 《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》清乾隆間王杰寫刊本（左）；《御製全韻詩》清乾隆間劉墉寫刊袖珍本（中）；《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》清乾隆間劉墉寫刊本（右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卿力邀魏浣初（字仲雪，1580-?）評釋《琵琶記》，並在牌記放上魏氏大名，當作宣傳重點以招徠讀者；牌記後附版畫插圖四幅，一圖一文，其構圖極可能影響到新都（又稱新安，今安徽省徽州）尊生館主人黃正位（字叔，歙縣人，生卒年不詳）《琵琶記》，兩

者版畫有著相似之處。

黃正位以《元本出相點板琵琶記》為底本，再將《琵琶記》製成可置於巾箱或藏於袖中的袖珍本，並按故事劇情需要附刻迷你版畫，穿插各卷。此雖非特例（另有《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記》一種，亦以巾箱本傳



圖11 | 《新刻魏仲雪先生批點琵琶記》明初古吳陳長卿刊本（上）；《琵琶記》明新都黃正位刊巾箱本（下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2 《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》清乾隆10年武英殿刊朱墨套印袖珍本（上）；《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》清乾隆10年武英殿刊朱墨套印本（下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世），然刻意縮小尺寸出版，並附插圖，俾使劇迷們隨身攜帶閱讀，實為成功的行銷手法。（圖 11）

圓明園，是清康熙皇帝（1654-1722，1662-1722 在位）於四十八年（1709）賜予皇四子雍親王胤禛（1678-1735，1723-1735 在位），作為親王隨扈休憩園林之處。胤禛繼位後進行了第一次園區擴建，乾隆即位後又再進一步拓展範圍，至乾隆九年（1744）大致完工。

對乾隆皇帝而言，圓明園曾是他與皇祖康熙、皇父雍正共聚一堂的祖孫三代的記憶，更是他日後得以成為帝位候選人的重要出發之處，是以圓明園實具有特殊意義，而當乾隆九年在圓明園第二次擴建完工之際，乾隆

皇帝隨之仿其祖父康熙皇帝為避暑山莊題三十六景之舉，也親自為圓明園取四十景，並為該園譜詩四十首，於次年交武英殿刊印。

院藏乾隆十年（1745）武英殿刊《圓明園四十景詩》分別有大小朱墨套印本兩種，大刊本除詩文外另附孫祐、沈源繪圖四十幅，小刊本僅有詩文而無圖，大小刊本比對，其外觀除反映皇室典雅的裝幀外，也更體現出乾隆皇帝對圓明園從創建至拓展的歷史記憶。（圖 12）

### 巾箱走四方

書肆中待價而沽的巾箱本，几案上文人伏讀的小書板，抑或宮中架陳設帝王御覽的袖珍本，內容都是些什麼？若由歷代文人購



藏巾箱小冊的種類及性質看來，當可分為士子焚膏繼晷的經史科考用書、文人几案抒懷的詩文笥記尺牘、讀書人居家常備的類書及醫藥方書；他如暇餘娛心的演義小說及民間戲曲、行萬里路必備的旅遊指南等，亦為文人隨身行篋的首要之選。

隨著明代中葉後貨幣經濟發達，全國長程貿易大幅擴張，巨商大賈活躍於各地重要城鎮，因此大量的商業用書也在此應運而生；加上每屆科考士子赴外長途旅程的需要，更使得這些路程書的出版廣受大眾歡迎。其內容不外於標註各地水陸路程遠近、提供市集商品種類、旅遊景點介紹、描述長程旅途防騙、防身的知識等，成為吸引外出遠行者購買的必備隨身手冊。院藏晚明蔣時機編的《石渠閣精訂天涯不問》袖珍書，即在此一時代背景下推出。

蔣時機，生卒不詳，晚明江蘇句容縣人，

而石渠閣或是他的書房，或為書肆名稱，平生以編書、校書、刻書為業。本書卷首〈江寧壽國平子甫題敘〉說：「積之不盈寸，展之不逾幅，浮航轉轂，出之袖中，何其簡以便也」，正具體指出此書以其小巧精緻，攜帶方便為特色；而本書以「天涯不問」為名，無疑是標榜一書在手，行走天涯不求人，藉以吸引讀者，用以提升銷量的用意。（圖 13）<sup>9</sup>

科舉是唐宋以來一種考試掄才的選官制度，而金榜題名，則是眾多參與科考士子多年寒窗的夢想，但亦有不少考生在考試作弊，試圖以更快方式取得終南捷徑。歷代以來，考試作弊形式多種，工具五花八門，不論是「懷挾本」或「夾袋（夾帶）冊」，還是將小抄藏入衣袋夾縫，或藏至筆管，或見於硯底、鞋襪，雖已非書籍開本形式，功能與夾小板異曲同工。這些內容，有的是考生自行



圖 13 《石渠閣精訂天涯不問》 明末刊袖珍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抄錄，有的則是雇人繕寫，然不管何種，若視其作弊材料上之蠅頭小楷、細字密佈，望之不得不使人深為驚嘆。

院藏一份清代夾帶絹布，其上細字如蠅，字跡清秀，全幅上下以手書紅線分隔四欄，每欄超過三百五十行，每行約三十八到四十字不等，粗估小抄超過五萬餘字。而從右緣斷裂痕跡推測，原件尺幅可能更長，字數更多。夾帶文字書寫自右至左，前大半內容有句逗紅點，餘小半部未見，推測可能是考生應試前來不及讀畢的結果。其內容主要出自《論語》各章及其釋義內容，各段中有紅色大字標示，或許是用作提示重點以便考試時易於查找。（圖 14）



圖14-2 | 清 單面夾帶（局部） 清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4-1 | 清 單面夾帶 清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由於本展覽旨在呈現巾箱本的淵源歷史、裝幀形式、開本尺寸與內容差異，因此上述「巾箱本五經」、「古人展書讀」、「皇家藏袖珍」，以及「大書配小書」、「巾箱走四方」五單元，正是將院藏巾箱本依其特性展出。觀眾透過展覽，不僅可瞭解古人藏書

於箱篋的文化背景，兼亦想見其行旅坐臥書必隨身，或展卷誦讀，或把玩賞鑒的文化現象。尤有進者，觀眾於欣賞文物之際，亦得以古證今，目睹袖珍本在圖書發展歷程中所展現的不同面貌。（圖 15）

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



圖 15 「古人掌中書——院藏巾箱本特展」展場一隅照 謝明松攝

#### 註釋

1. (唐)李延壽撰，《南史》，收入《百納本二十四史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2010 臺二版，據上海涵芬樓影印北平圖書館及自藏元大德刻本），冊 14，卷 41，〈衡陽元王道度〉，頁 14-436。
2. (梁)蕭繹撰，《金樓子》，收入《文津閣四庫全書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6，據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 49 年〔1784〕文津閣本影印），冊 850，頁 850-784。
3. (宋)朱熹，〈答呂伯恭〉，收入《晦庵集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-1986 年間出版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，冊 1143，卷 33，頁 747。
4. (宋)朱熹，〈答呂伯恭〉，收入《晦庵集》，卷 33，頁 746。
5. (宋)張栻，《南軒先生文集》，卷 21，收入曾棗莊、劉琳主編，《全宋文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、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6 年 8 月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宋淳熙慶元間嚴州刊本影印），冊 255，卷 5724，〈答朱元晦秘書〉，頁 85。
6. (明)朱橚，〈袖珍方序〉，收入《袖珍方》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正德四年御用太監廖氏中州刊本。
7. (宋)戴埴撰，《鼠璞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-1986 年間出版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 47 年〔1782〕文淵閣本影印），子部冊 160，頁 85。
8. 見賴毓芝，〈清末石印的興起與上海日本畫譜類書籍的流通——以《點石齋叢畫》為中心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，85 期（2014.9），頁 57-127。
9. 見吳璧雍，〈《石渠閣精訂天涯不問》——一部院藏袖珍本旅行交通手冊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248 期（2003.11），頁 82-87。